

明治初期的正倉院寶物展示與西方人士之報導： 古代珍藏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之早期例證*

巫佩蓉**

提 要

位於奈良東大寺域內的正倉院寶物庫及其內藏品，不僅日本人珍視，更是國際人士共同關注的文化遺產。正倉院獨特之處，在於相當數量的物件履歷可溯至 8 世紀，並可作為亞洲各區域間，尤其是西亞與東亞間交流的實證。然而，這批物件何時始為國際人士知曉？明治初期的公開狀況如何？當時外國觀者以何種角度觀看與書寫？

本文研究 1870 至 1880 年代初的材料，首先整理明治初期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寶物的展示狀況。第二部份則以一篇 1875 年《日本週報》(*The Japan Weekly Mail*) 的英文報導為主，探討當時國際人士對正倉院及其藏品的認知。第三部分，由英國設計師卓瑟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1882 年出版的書籍，探索他 1877 年於奈良親見正倉院藏品時的見聞。

正倉院之管理制度與藏品的系統化整理，直到 1890 年代才漸趨明確。然而，1870 至 1880 年代初期，多樣物件已透過奈良博覽會的展出，公諸於世，且出現英文書寫的報導。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尚未開展，展覽會目錄排序也未見具有明確意義，但展品整體的多元，以及物件本身的樣式、材質、製作特色等，可能反映出的古代國際文化交流，已經吸引了西方觀者的目光。這些報導或書寫雖非學術研究，但它們出現之早，非常值得注意。特別當我們考慮西方人士於亞洲的探險活動及相關出版，二十世紀之後才廣受注意，「奈良寶庫」文物呈現出的古代國際交流實證，更顯意義非凡。

關鍵詞：正倉院、奈良博覽會、東西交流、十九世紀、日本週報、卓瑟

* 收稿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1879 年英國建築師所見的奈良與京都」(Most 108-2410-H-008-032-MY2) 之部分成果，謝謝前後多位助理，林怡利、張育晴、謝宜君、劉思涵的協助。2019 年於日本與多位國內外學者一起觀看特展，討論之間，多有啓發，至為感謝。Covid-19 疫情期間，資料取得困難，謝謝楊雅琪協助。最後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建議。

**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正倉院及其藏品，無論在日本國內或國際上，皆具有極高的知名度。每年秋季於奈良國立博物館舉辦的「正倉院展」，始於二次戰後的 1946 年，至 2021 年已舉辦過 73 回。¹ 此展每年約有 60 至 80 項展品，為期約兩週左右，卻常有十萬以上的觀覽人次，除了日本人之外，也吸引大量國外的專家學者和一般觀眾。如此受歡迎且持續 70 年以上連續舉辦的展覽，在世界上可謂極為罕見。對二十一世紀的觀者而言，一提及正倉院藏品，並不認為其意義僅限於日本史或日本美術史的領域，反而更關注它們體現了古代絲路廣大區域間的國際交流。種類繁多的物件，除了具現唐代中國本土與日本間的交流之外，有些更帶有西亞、西域、印度等多元風格特色，備受矚目。然而，日本人及國際人士對於正倉院藏品意義定位的認知，究竟始於何時？今日眾人熟知，始於 1946 年的年度「正倉院展」開辦之前，藏品的公開狀況、評價方向為何？又，正倉院之國際知名度成立的源頭與過程，有無值得吾人探討之處？

現代社會對於正倉院的認識，肇始於十九世紀後半。1872 年（明治五年，壬申年），由日本官方進行的「壬申檢查」，是以現代方法整理、研究正倉院寶物的起點。² 約 150 年來，與正倉院相關的研究論文、推廣文章、圖版發行數量之多，以汗牛充棟來形容也不為過。舉其要者，由正倉院事物所編纂，1994 至 1997 年出版的《正倉院宝物》10 大冊，便是官方整理的總集。³ 由日本四大國立博物館監修的《日本の美術》系列，與正倉院相關的便有 15 冊之多。⁴ 此系列出版雖有推廣性

1 奈良國立博物館，〈第 73 回正倉院展〉，《奈良国立博物館官網》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special/202110_shosoin/（檢索日期：2022 年 1 月 24 日）。

2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頁 72-80；壬申檢查的相關資料，亦可由 e museum（e 國寶）網頁取得：e 國寶，〈壬申檢查關係資料〉，《e 國寶》https://emuseum.nich.go.jp/detail?langId=ja&webView=&content_base_id=100815&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img_id=null&page_id=null（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

3 正倉院事物所編，《正倉院宝物》全 10 冊（東京：朝日新聞，1994-1997）。

4 松本包夫，《日本の美術 102 正倉院の染織》（東京：至文堂，1974）；松島順正，《日本の美術 105 正倉院の書跡》（東京：至文堂，1975）；阿部弘，《日本の美術 117 正倉院の樂器》（東京：至文堂，1976）；藤岡了一，《日本の美術 128 正倉院の陶器》（東京：至文堂，1977）；後藤四郎，《日本の美術 140 正倉院の歴史》（東京：至文堂，1978）；中野政樹，《日本の美術 141 正倉院の金工》（東京：至文堂，1978）；岡田讓，《日本の美術 149 正倉院の漆器》（東京：至文堂，1978）；關根眞隆，《日本の美術 193 正倉院の木工芸》（東京：至文堂，1982）；松本包夫，《日本の美術 293 正倉院の錦》（東京：至文堂，1990）；木村法光，《日本の美術 294 正倉院の調度》（東京：至文堂，1990）；西川明彦，《日本の美術 486 正倉院宝物の裝飾

質，但執筆者皆為該領域的頂尖專家，每一冊背後都有堅實的學術累積。此外，1946年來隨「正倉院展」編纂的展覽圖錄，依日本學界慣例，除了綜合性介紹之外，也是嶄新研究成果的發表場域，七十餘年累積下的成果相當可觀。然而，如2015年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一文指出，與正倉院相關的研究，多屬古代史的範圍，以正倉院與近現代社會之關聯性為研究取徑的論文，相當少見。⁵

以「正倉院的歷史」、「正倉院寶物的歷史」為題的書籍或文章，內容多以收藏主體形成的年代（八世紀），或個別物件產出的年代為關注點。雖有些論文也略論八世紀至江戶時代（1603-1867）的大致發展，但相對簡要許多。而十九世紀後期以來，正倉院及其藏品被納入近現代社會文化一環的議題，則更少見學者深入探索。⁶當然，這方面的研究並非完全闕如。有關明治（1868-1912）初期日本官方調查，以及行政管理方面變遷的資料，已有頗為清楚的整理。自1872年的「壬申檢查」後，正倉院歷經內務省、農商務省、宮內省、皇室博物館等機構的管轄過程，以及「正倉院御物整理掛」的工作項目等，有明晰的軌跡可循。⁷然而，無論是資料集成或研究論文，對於正倉院於近現代社會中角色變遷的書寫，多以釐清客觀資料為主，較少見主觀的分析論述。⁸相對地，有些學者在非以正倉院及其藏品為主軸的研究中，提出具議論性質的詮釋，主張明治政府有意識地以正倉院及奈良地區其他文物，作為提昇天皇聲望的手段，乃屬日本近代強化帝國統治的策略。⁹然而，這類由歷史學家主導的研究，雖頗有參考價值，卻往往缺乏對正倉院藏品個別風格特徵，以及由風格特徵衍生出之意義層面的關注。

技法》（東京：至文堂，2006）；田中陽子，《日本の美術 520 正倉院の舞樂装束》（東京：至文堂，2009）；飯田剛彦，《日本の美術 521 正倉院の地図》（東京：至文堂，2009）；成瀬正和，《日本の美術 522 正倉院の宝飾鏡》（東京：至文堂，2009）；西川明彦，《日本の美術 523 正倉院の武器・武具・馬具》（東京：至文堂，2009）。

5 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40輯（2015.3），頁93-119。

6 後藤四郎，《日本の美術 140 正倉院の歴史》；米田雄介，《正倉院宝物の歴史と保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7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162-172；東野治之，〈正倉院宝物の明治整理——正倉院御物整理掛の活動を中心に〉，收入大阪大學文學部日本史研究室編，《古代中世の社會と國家》（大阪：清文堂，1998），頁221-242。

8 和田軍一提及較多明治之後與正倉院公開有關之事務，但以隨筆方式寫出，無詳細的註釋。和田軍一，《正倉院夜話：宝物は語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67）。

9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的文化史的研究》（東京：校倉書房，1997）。

除了官方的管理、整理、意圖之外，明治年間的正倉院是否受到一般日本民眾關心，是否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更是學界尚未充分討論的議題。不僅研究論文數量不多且篇幅不長，即使連基礎的資料釐清工作也尚未完善。要探索日本或國外觀眾認知脈絡的前提，需先釐清明治時期正倉院展品的公開展示狀況，以及目錄或圖版印刷出版情況等，但這些頗為關鍵的要點都僅見零星討論。在公開展示方面，「壬申檢查」之後，1875至1880年間，正倉院藏品曾於「奈良博覽會」中展出。此為本文第二節將處理的問題，既有的相關研究也將於該節引用，於此不再贅述。1880年代之後，正倉院藏品的「公開」，主要以每年夏季一個月「曝涼」時接受申請參觀的方式進行。2017年田良島哲（東京國立博物館館員）曾討論部分時期的細節，但也非全盤探討。¹⁰至於圖版印刷出版方面，據筆者所知，較早的石印圖版有1881年（明治14年）的《國華餘芳》，此圖錄包括「正倉院御物」、「伊勢內外神寶部」、「古書之部」等。¹¹更重要的是1908年《東瀛珠光》6大冊的出版。¹²這些資料偶見簡要提及，但尚未知有學者以此圖錄之編纂或傳布為主要研究對象。¹³

至於明治時代的國際人士，對正倉院藏品的評價如何，更是一個受學界忽略的研究面向。如巫佩蓉於2020年兩篇論文中所提，學界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歐美日交流研究雖然盛行，卻偏重於被帶到海外的作品，尤其是浮世繪。¹⁴至於西方人士在日本的見識與書寫，尤其是對江戶時代之前古代作品的認知狀況，則尚未被充分探索。即使有些較深入的研究，也僅集中於特定人士，如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又譯為芬諾洛薩）身上。¹⁵其實，在費諾羅沙1878年來到日本之前，早有眾多西方人士，有機會見聞今日被評價為日本國寶或

10 田良島哲，〈大正期の正倉院持經資格の拡大と帝室博物館総長森鷗外〉，《Museum：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666號（2017.2），頁29-46。

11（明治）《國華餘芳：正倉院御物》（東京：印刷局，1881）。

12（明治）《東瀛珠光》全6輯（東京：審美書院，1908-1909）。

13 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頁110-111。

14 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1880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為中心的考察〉，《新史學》，31卷1期（2020.3），頁103-147；巫佩蓉，〈1880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藝術學研究》，27期（2020.12），頁1-42。

15 與費諾羅沙相關的研究，參見：巫佩蓉，〈二十世紀初西洋眼光中的文人畫：費諾羅沙的理解與誤解〉，《藝術學研究》，10期（2012.5），頁87-132。有關費諾羅沙在日本的活動，見：瀧悌三，〈日本近代美術事件史〉（大阪：東方出版，1993），頁109-164。

世界文化遺產等級的古代文物，也包括正倉院的藏品。當時的「見聞」如何，實為吾人探索十九世紀後期東西交流的重要材料。在這方面，鈴木廣之於 2008 年的「正倉院展 60 回紀念研討會」中發表，2012 年出版之文曾經提及。¹⁶ 然而，與筆者基本立場迥異，鈴木認為 1880 年代後期之後對正倉院的評價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文中也簡要提到本文使用的一些資料，但並無如本文般以大量的篇幅討論。筆者認為，1870 年代的諸多事件，皆有細膩考察的必要。西方人士，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見到正倉院藏品？特別是，他們究竟可能見到多少種類與品項？伴隨著展示內容，他們可能接觸到哪些來自日本方面的資訊？又是否有不同於日本人的觀察重點或角度？

明治時代歷時 45 年，此間正倉院之主管機構歷經變化，管理與公開的原則也頗見差異。客觀梳理歷程之外，主管機構變動的因素與變動後的影響、與其他文化政策的相互關聯性、公開方式與資訊傳布的影響力、與當時海內外研究者間的關係等，諸多於近現代史中頗具意義的觀察點，都尚未經充分討論，有待未來學界的關注。在只有零星相關研究的現狀下，本文篇幅不可能處理明治時代所有的情況，故擬聚焦在 1870 年代，探索日本官方系統的整理研究尚未肇始之前的公開活動，以及外國觀者的報導。內容如下，第二節處理與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寶物展示相關的議題。第三節則以一篇 1875 年《日本週報》(*The Japan Weekly Mail*) 的英文報導為主要材料，探討當時參觀奈良博覽會的國際人士，對正倉院及其藏品的認知。第四節，由目前所知最早被允許進入正倉院建物之內的西方人，即 1876 至 1877 年訪問日本的英國設計師，卓瑟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之書寫，繼續探究國際人士認知的議題。最後一節作綜合討論。如前所述，以正倉院與近現代社會關聯性為研究取徑的論述，尚不充足，連基礎資料釐清工作也尚未完整。因此，本文有部分篇幅必須梳理一手資料的細節。梳理資料細節之外，本文也提供若干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於 1870 年代作者親身經歷，於 1870 年代至 1880 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字，是在極少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寫出。若考慮同以呈現跨地域文化交流軌跡的重要文物，如敦煌地區作品，直到二十世紀之後才漸為世人所知。這些 1870 年代的英文書寫，實有獨特之價值。

16 鈴木廣之，〈明治期の正倉院——宝物の調査、展示、評價〉，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正倉院宝物に学ぶ 2》(京都：思文閣，2012)，頁 3-19。

二、正倉院寶物於明治初期的公開

明治年間，日本官方調查與管理正倉院的歷程簡述如下。1872年，日本官方開始對古寺社保有的古物進行調查，這是現代調查、研究、收藏維護、展覽古物的開端。此次調查，位於東大寺的正倉院也是主要標的之一，但並非唯一標的。關西地區諸多寺院神社，皆在調查範圍。¹⁷ 就正倉院而言，這是自江戶時代天保四年（1833）以來，再度有明確記錄的開啓。然而，壬申檢查之後，日本政府似乎尚未對古文物的保存、管理、研究、公開等，採取系統性的措施，可說是尚處於摸索的階段。現有與正倉院相關的研究中，除了述明「壬申檢查」之外，也有些提及正倉院寶物曾於奈良博覽會展出，但多半僅簡要提及，並未探討展示的規模等詳細狀況，遑論評論展示的意義或影響。¹⁸ 首先要釐清的是，在管理層面上，壬申檢查之後，1875年正倉院被劃歸為日本國家管理，但明確的制度尚未建立，管理的單位幾經變動。1875年在內務省轄下，1881年起，器物歸農商務省，圖書歸內務省，但勅封開鎖（建物之開閉）則歸宮內省，1884年管理權全歸於宮內省，1908年又劃歸由皇室博物館管理。¹⁹ 另一方面，1883年開始一年一度的開封寶物點檢制度（又稱為「曝涼」），1889年起則允許每年點檢時可申請參觀，唯參觀人數僅限每日20人。²⁰ 此外，自國家管理以來，物件雖陸續局部整理，但直到1892至1904年之間，由「宮內省御物掛」部門，統合整理並編纂《正倉院御物目錄》，才確認了寶物的範圍。²¹

然而，在日本中央政府正式確立正倉院的管理制度前，1870年代就有幾次的寶物展出。這幾次展示並非由中央政府舉辦，也不是以保存古文物或發揚古文化為主旨，而是與地方人士組成，以殖產興業、獎勵工商為主要目的的「奈良博覽

17 有關「壬申檢查」與古寺社，請參見：蜷川式胤著，米崎清實編，《奈良の筋道》（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5）。

18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162-166；後藤四郎，《日本の美術140 正倉院の歴史》，頁72。

19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234-235；後藤四郎，《日本の美術140 正倉院の歴史》，頁72-75；西山厚，〈正倉院寶物とその公開〉，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64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2），頁6-12。

20 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頁98。

21 東野治之，〈正倉院寶物の明治整理——正倉院御物整理掛の活動を中心に〉，頁221-242。並參見：飯田剛彦，〈正倉院の歴史〉，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頁9-17；米田雄介，《正倉院寶物の歴史と保存》，頁172-200。

會」有密切的關係。相關的事蹟，少見美術史學者關注，研究者多為奈良地方史學者。

1874年，奈良地方官民共同籌設「奈良博覽會社」，並將社址設於東大寺之龍松院。²²此博覽會標舉殖產興業、獎勵工商的目的，但實際舉辦時有大量的古今物品展覽，性質相當複雜，並非純粹展出正倉院物件。²³不過，由當時史料看來，會社籌設之時，便有考慮於博覽會中展出正倉院藏品的想法。並且，會社的首任會長，正是奈良當地管理正倉院寶物庫鑰匙之人，植村久道。²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學界對於明治時期日本各地頻繁舉行的「博覽會」已有較深入的評價。這些標舉為新式展覽，並且用了嶄新的「博覽會」一詞的活動，開展主旨與實質內容經常無法完全相符。各地博覽會不但展品新舊物件並陳，甚至有古物更為吸引觀者的情況。²⁵「奈良博覽會」於展品中包含數量頗多的古物，並非當時的特例，但在執行面上比較複雜。由於正倉院已劃歸中央政府管理，因此展出其中藏品並非奈良博覽會社所能決定，亦非由正倉院所在的東大寺寺方決定，而是須取得政府官員首肯。²⁶由現有資料可知，明治初期，奈良地方主辦單位之請求，獲得同意，而京都博覽會之主辦人員也曾請示中央政府官員，可否展覽正倉院之物，但並未獲准。²⁷然而，這些決定的關鍵細節，並不清楚，僅知「壬申檢查」時前往正倉院調查的中央官員，蜷川式胤（1835-1882）、町田久成（1838-1897），都曾於奈良博覽

22 高橋隆博，〈「奈良博覽會」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月刊文化財》，217期（1981.10），頁37-45，特別是頁37-39；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卷4號（2013.3），頁55-101，特別是頁62-63。

23 山上豊，〈正倉院御物と奈良博覽會——とくに明治10年代の動向を中心に〉，《歴史評論》，573期（1993.1），頁28-39。

24 〈明治〉〈奈良博覽會結社濫觴及沿革概略譜〉，原文抄錄於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卷4號（2013.3），頁76-77；〈明治〉〈藤田文庫 明治八年創立奈良博覽會〉，原文抄錄於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卷4號（2013.3），頁100-101。

25 Peter Francis Kornicki, "Display and Changing Values: Early Meiji Exhibitions and Their Precursors," *Monumenta Nipponica* 49:2 (1994): 167-196.

26 高橋隆博，〈「奈良博覽會」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頁38-39；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頁55-101，特別是頁60-62。

27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162-166。有關京都博覽會，參見：丸山宏，〈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覽會〉，收入吉田光邦，《万国博覽會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頁221-248。

會籌備期間，表示對展出正倉院寶物的支持。²⁸

我們對正倉院展品於奈良博覽會的展出詳情，所知尚屬有限，僅能由高橋隆博、山上豐的研究中略知梗概。1875年奈良博覽會首度舉行，會期由四月一日至六月十九日，共80日，展覽會會場在東大寺境內。此博覽會歷年多於春天舉行，但1877年因西南戰爭爆發而取消辦理，現有直至1894年的資料。²⁹而正倉院的展品，僅出現於第一（1875年）、二（1876年）、三（1878年）、五（1880年）回的奈良博覽會。相當值得注目的是參觀人數，第一回奈良博覽會，高達172016人參觀。第二回至第五回，人數少則九萬餘人，多則十五萬餘人，以十九世紀後期而言，可謂相當成功。³⁰若對比1880年代之後的「曝涼」參觀，每日僅限20人，1870年代的奈良博覽會，可說是明治期能見到正倉院寶物的最佳機會。有關這一點，將於本文最後一節討論。另外值得關注的是，1875年五月的日文報紙中，曾經評論過奈良博覽會受歡迎的程度。報導中言，博覽會剛開幕時，觀覽人數甚少，「場所靜閑」，但因展品「珍奇古雅」，漸得人望，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當時的京都博覽會。³¹這樣的評論，相當令人深思。明治初期日本各地舉行的博覽會，雖然多標舉以廣開民智，振興產業為目的，但由此篇報導反映出的實況，某些地方的博覽會真正吸引人的，似乎是古物。另一方面，除了展示之外，奈良博覽會社亦有安排摹寫、模造正倉院物件，作為發展當地工藝品的參考。³²

1870年代到1880年的4次奈良博覽會中，展出的正倉院寶物究竟是哪些物件？筆者尚未搜尋到有學者針對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展件，作詳盡完整的研究，

28 山上豐，〈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頁55-101，特別是頁60-62。

29 除了1877年，因西南戰爭爆發，局勢不穩而未舉辦之外，1875年起，至1890年（明治23年），年年舉辦。1890年舉辦第十五回，第十六回資料不詳，1893年第十七回，1894年第十八回，參見：北廣麻貴，〈メディアの中の奈良博覽會：明治期の新聞記事からの考察〉，《ディア学：文化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30期（2015），頁1-16，特別是頁4。

30 人數資料參見：山上豐，〈正倉院御物と奈良博覽會——とくに明治10年代の動向を中心に〉，頁32。第二回，93009人；第三回，154199人；第四回，104228人；第五回，110812人。

31 此報導出自：（明治）〈諸縣報知〉，《郵便報知新聞》，明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28日），轉引自山上豐，〈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卷4號（2013.3），頁63。

32 高橋隆博，〈「奈良博覽會」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頁44-45。高橋提及原始資料為藤田祥光稿，〈正倉院資料〉，藏於奈良縣立奈良圖書館。筆者尚未有機會調查。

僅見短篇文字之中，推測數件當時的展件。³³ 在此僅能以所知的一手資料，提出初步的看法。以目前公開的資料來說，筆者僅見第一回與第二回的展品目錄的抄錄，以及目錄的複製圖版，其他學者的論文中也未提及他回目錄的存在。第一、第二回奈良博覽會的展品目錄，原本僅存於日本少數圖書館或資料館，但有數種重新編排的出版品。因這些出版品於品項編號上有些混亂之處，有說明的必要。限於本文篇幅與研究主題，以下將以第一回展品目錄為主要研究材料。³⁴

由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編纂的《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錄：明治四年—九年》一書，是通行最廣的研究基礎資料。此書收有多種博覽會展品資料，並將展品品項加以編號。其中有兩種明治八年（1875）的資料，其一標為〈奈良博覽會物品目錄〉（書中又稱〈第1回奈良博覽會A〉），另一標為〈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書中又稱〈第1回奈良博覽會B〉）。³⁵ 書中註明，〈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分為第一至七號，共有7張紙，每張31乘43公分。每一號目錄所收物品項目不等，合計共286項。³⁶ A、B兩種目錄並不重覆，換言之，正倉院展品皆列於目錄B，目錄A是奈良博覽會中其他展品。因目錄A與本文主旨無關，不予討論。在此須先釐清目錄B的品目統計，所列數字並不精確。筆者由他處看到部分原目錄圖版的照片或翻印，發現目錄原件並無展件編號。³⁷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整理編纂時，加上編號，但似乎將部分展件品目的補充說明，或是插圖的標題，視為另一個品項，以致編號與實際展件項目並不完全相符。高橋隆博的論文中，則指出第一回奈良博覽會有222項正倉院

33 線上資訊見：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圖書展示「正倉院展と奈良博覽會～正倉院宝物公開の歴史～」平成30年11月1日（木）～29日（木）展示パネル一覧（PDF）〉，《奈良県立圖書情報館》，<https://www.library.pref.nara.jp/sites/default/files/narahaku2018.pdf>（檢索日期：2021年6月30日）；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 まほろばライブラリー検索，〈奈良博覽會物品目錄〉，《奈良県立圖書情報館》，<https://meta01.library.pref.nara.jp/opac/repository/repo/153598/#?c=0&m=0&s=0&cv=0&r=0&xywh=1931%2C-996%2C7664%2C6704>（檢索日期：2022年7月27日）。

34 高橋隆博文中提及，僅知第一回與第二回展目存世。高橋隆博，〈「奈良博覽會」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頁37-45。

35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錄：明治四年—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564-583。

36 目錄第一號：1至37，第二號：38-104，第三號：105-139，第四號：140-169，第五號：170-205，第六號：206-255，第七號：256-286。

37 高橋隆博，〈「奈良博覽會」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頁37-45，特別是頁40-41。高橋隆博此文將原藏於奈良縣立奈良圖書館、東大寺圖書館藏的目錄作為插圖，圖版很小，文字無法確認，但可見到排版原貌。

藏品，第二回則有 153 項。³⁸ 然而，由於目錄中有「古文書 數函」、「繪屏風 十五」之類的記錄，這些紀錄應該要記為一項或數項，難以清楚認定，僅能暫記於此。即使項目數無法分毫不差地確定，但 1875 年第一回的奈良博覽會，展出了 200 項以上的正倉院物件，1876 年第二回展示則約有 150 項，應無疑問。對比現行的年度正倉院展，每年大約選 60 至 80 項，可知 1870 年代的展覽規模相當大。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原來的展品目錄中，附有少數插圖。高橋於論文中，翻印原目錄內容，文字清晰可讀，也包括插圖，但非原來的版式。³⁹ 這些插圖描繪相當簡單，但仍有利於我們確認部分的展件。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分爲第一至七號，是否表示展品有輪替展出的狀況，筆者尚無資料可得知。因單篇論文的研究時間及篇幅所限，目錄全體的詳細研究還有待未來。在此，筆者擬抄錄第一號目錄的內容，使讀者能具體了解此目錄的性質，特別是由此可知展出的物件種類頗多，但目錄排列似無依循明確的原理。以下阿拉伯數字爲《明治期府県博覽会出品目錄》一書中的編號，括弧內國字爲筆者重新計算。⁴⁰

1. (一) 平城宮御宇天皇御祭服 二領
2. (二) 聖武天皇宸翰銅板 一枚
3. (三) 緋町方帶 一綴
4. (四) 錦御幕 一箱
5. (五) 錦御襪 一足
6. (六) 平絹御几帳 二

38 高橋隆博，〈「奈良博覽会」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頁 40、42。另一文中指出，目錄中所列是博覽會中的非賣品，預定出售的物件並沒有列於目錄中，參見：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覽会」陳列目錄について〉上，《史泉》，56 期（1981.11），頁 76-118，特別是頁 82。又於另一文中，高橋提及第一回奈良博覽會的正倉院展件有 222 項，1725 點（件），但未說明原始資料來源。見：高橋隆博，〈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と正倉院〉，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正倉院宝物に学ぶ 3》（京都：思文閣，2019），頁 119-137，件數見於頁 134。

39 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覽会」陳列目錄について〉上，頁 76-118；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覽会」陳列目錄について〉下，《史泉》，57 期（1982.12），頁 47-82。

40 以下內容取自：（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第一回奈良博覽會 B）第一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会出品目錄：明治四年—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 579，並對比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覽会」陳列目錄について〉上，頁 108-110。

7. (七) 黃絹御藥袋 一
8. (八) 子日御几褥 一
9. (九) 紅染象牙尺 長九寸八分 六本
10. (十) 綠染象牙尺 長九(寸)八分 二本⁴¹
11. (十一) 象牙尺 二本
12. (十二) 象牙札 三枚
13. 內一枚
表銘平城宮御宇太上天皇恆持心經
裏銘天平勝寶五年歲次癸巳三月廿九日
14. 內一枚
表銘仁王會獻盧舍納佛淺香一村
裏銘天平勝寶五年歲次癸巳三月廿九日
15. (十三) 御箱 八箇
16. 內一 革製黑漆金銀切金ヲ以鳳凰唐草ヲ描ク
蓋裏張紙銘會所獻物 瑞碧念珠 古錠
針差紙 塞 金銅鈴等ヲ盛ル
17. 內二 革製黑漆
18. 內一 木製五色唐草模様
19. 內一 唐木寄細工
20. 內一 沉香寄木金具純金
21. 內一 沉香製金泥ヲ以梅花ヲ畫ク
高三寸五分 橫七寸六分 豎九寸六分
22. 內一 紫檀製金具純金
高三寸二分 橫七寸四分 豎五寸四分
23. (十四) 御琵琶 海老尾ヲ失ス 一
24. (十五) 古文書 數函
內二 平城宮御宇天皇宸翰及弓削道鏡真

41 (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號無「寸」字，寸字依高橋隆博文加。

- 跡等アリ 其傳（他）枚舉ニ暇アラヌ⁴²
25. (十六) 繪屏風 十五
26. (十七) 鳥毛御屏風 一雙
高サ四尺八寸 文綵アル鴨羽ヲ以文字ノ上ヲ筆勢ニ隨テ張付縁ヲ
ジャバラノ如ク縫付タルナリ
27. (十八) 樂器 名不分 長二尺五寸五分 一
28. (十九) 黒漆酒器 長二尺五寸三分二
29. (二十) 東大寺墾田地圖 七枚
30. 内一 越中國新川大荊村懇（墾）田地云々⁴³
神護景雲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31. 内二 越中國礪波郡伊加流伎野地云々
天平寶字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32. 内一 越前國足羽郡糞置村地云々
天平寶字三年十二月三日
33. 内一 磨滅不分明
天平寶字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34. 内一 越前國足羽郡糞置村地云々
天平神護二年十月廿一日
35. 内一 磨滅不分明
36. (二十一) 銀壺 二
狩獵毛彫ノ模様アリ
裏銘東大寺銀壺重大五十五斤甲蓋實並
臺總重大七十四斤十二兩
天平神護三年二月四日
總高サ一尺六寸三分 口徑一尺四寸二分
37. (二十二) 葛製箆 四
長二尺三寸七分 長一尺一寸八分

42 (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號：傳，高橋隆博文：他。

43 (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號：懇，高橋隆博文：墾。

依《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錄》一書之編號，〈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第一號共有 37 項。但若扣除「内一」、「内二」之類的說明，實為 22 項。若以件數計，有 65 件（繪屏風十五，暫計為 15 件，但鳥毛御屏風一雙，計為 1 件），另有古文書數函不計。此目錄之附圖，包括：紅染象牙尺、綠染象牙尺、御箱之中的紫檀筥、沉香製金泥畫梅花箱、鳥毛御屏風、名稱不詳的樂器、黑漆酒器、銀壺、葛製箆。（圖 1）⁴⁴ 由於有附圖，可知目錄中的鳥毛御屏風，是書有「種好田良易以得穀」詩句之作（圖 2）。⁴⁵ 可惜的是，目錄所列繪屏風雖多達十五，但既無簡要文字描述，也無附圖，以致無從得知是指哪些。又，所謂「十五」，是指 15 個畫面（稱為一扇或一曲），或 15 隻（一隻屏風，可能有二曲到八曲不等），也不明確。

這份目錄的展件排列順序，頗難歸納出原則。可以確定的是，第一號目錄中，排在最前面的「平城宮御宇天皇御祭服」、「聖武天皇宸翰銅板」，是和天皇直接相關的物件，可能以此強調展覽品與天皇有深厚的淵源。⁴⁶ 除此之外，其餘物件則看不出有明確的排列原理，與著名的《東大寺獻物帳》，亦無對應關係。⁴⁷ 整體看來，展出物件的類型頗多，是一大特色。以第一號目錄而言，包括織品與衣物、刻有文字的銅板、象牙製品、皮革箱、木箱、樂器、文書、屏風、漆器、地圖、銀器、葛器。葛製器物，這個名稱一般比較不熟悉，乃植物藤蔓編織而成。第七十二回正倉院展中有一件《漆葛胡祿》，是裝矢箭的器物，依圖錄看來，與第一號目錄中的簡圖頗相似。⁴⁸

目前並無資料，顯示奈良博覽會中的正倉院展件由何人挑選，亦未見任何的展件說明。這使得我們要分析展覽意義時，頗為困難。即使如此，仍可作初步的

44 (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網路上可找到由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提供的圖：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圖書展示「正倉院展と奈良博覽會～正倉院宝物公開の歴史～」平成30年11月1日(木)～29日(木)〉展示パネル一覧(PDF)；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まほろばライブラリー検索，〈奈良博覽會物品目錄〉。

45 此屏風現行名稱為《鳥毛帖成文書屏風》(北倉)，曾於第65回正倉院展中展出，見：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65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3)，頁20-21，展件5。

46 「聖武天皇宸翰銅板」，可能是第58回正倉院展中的1號展件，《勅書銅板》(中倉)，見：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58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6)，頁14-15，展件1。

47 《東大寺獻物帳》之圖版及簡要說明，參見：飯田剛彦，〈東大寺獻物帳と法隆寺獻物帳〉，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圖5、頁46-47。

48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72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20)，頁102-103，展件56。

推論。展品總量之多，十分值得注意。雖如本文前述，精確的數字難以確認，但〈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至第七號，物件至少在 200 項以上。對比近年舉辦的正倉院展，每回展件大多僅有 60 項左右。另由目錄看來，即使展覽方針不明確，主辦方至少懷有展示多樣類型物件的企圖，當時的觀者確實可親眼見到正倉院物件種類之繁多。百餘年之後，曾任正倉院事務所長的米田雄介，簡要說明過歷年奈良博物館正倉院展的展示原則：一、使觀者了解正倉院寶物全貌，二、使觀者了解正倉院寶物成立過程，三、避免同一寶物頻繁出陳。⁴⁹ 以 1875 年的展覽而言，似乎尚無全盤的考慮，特別是對於正倉院寶物成立過程，尤其是皇室獻納給東大寺之事，並無著墨。而參與這次展覽的觀者感想如何，筆者學淺，尚未見日本人書寫的感言，反而尋得英文的報導，由此可一窺國際人士的看法。

三、1875 年《日本週報》的報導

1875 年六月十二日的《日本週報》，有一篇以〈奈良展覽〉（“The Nara Exhibition”）為題的報導。⁵⁰ 此文中的展覽，正是指 1875 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九日，於東大寺舉行的第一回奈良博覽會。就刊登的日期看來，此文於展覽會將結束時才刊出，目的應不是為了鼓勵日本境內的外國人前去看展，而是認為此展覽的內容有報導的價值。文中提及，今年夏天有很多外國人看了奈良博覽會，但或許觀眾並不瞭解展場物件極為不凡的特質（extraordinary character of the objects）。通篇的書寫，展現出作者對此不凡特質的深刻肯定。另外，作者提及很多外國人前往觀看，也值得我們注意。幕末開國至明治初期，相對於神戶、大阪等關西商業城市，奈良並非外國人經常活動的區域。但 1874 年日本官方放寬內地旅行的限制後，外國人旅行的範圍增大。⁵¹ 況且，《日本週報》的發行所遠在東日本的橫濱，可見奈良博覽會吸引了廣大區域的外國觀者。

49 米田雄介，《正倉院宝物の歴史と保存》，頁 218-224。

50 “The Nara Exhibition,” *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12, 1875, accessed August 10, 2021, <https://play.google.com/books/reader?id=CmMvAQAAMAAJ&pg=GBS.PA506&hl=zh-TW&printsec=frontcover>.

51 丸山宏，〈近代ツーリズムの黎明：「内地旅行」をめくって〉，收入吉田光邦編，《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変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 89-112。

《日本週報》於 1870 年於橫濱開始發行，是明治時代最主要的英文報之一。除了日本本地讀者之外，作者也可能有意報導日本境內的活動給其他區域的英文讀者知曉。《日本週報》有些海外讀者，詳細人數不明。但有一筆資料顯示，1873 年九月至 1875 年十二月期間，日本政府長期訂閱 500 份《日本週報》，並支付寄送至海外的郵資，後來因政府不滿此報某些報導的立場而停止贊助。⁵² 而〈奈良展覽〉一文刊出時，正是《日本週報》受到支持而海外流通量頗大的時期。

〈奈良展覽〉一文並非只報導正倉院展品。此篇文章結構前後分得很清楚，前半以正倉院展品為核心，後半則是與奈良博覽會有關的其他報導，提及正倉院物件之外的展品，並說明有些是預備售出的品項。鈴木廣之也曾注意《日本週刊》的報導，並於論文中主張，報導中用「curiosity」一詞，可見作者僅是將正倉院之物視為骨董或珍奇之物。⁵³ 然而，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日本週刊》一文作者，固未清楚地視正倉院之物為美術品（fine art），但對於這些物件的歷史意義及外國淵源皆頗為關心，已經顯現出較為嚴肅的興趣。書寫內容顯示作者具有知識性的關心，絕非僅視展品為稀奇珍玩。《日本週報》先以頗長的段落介紹奈良時代的歷史，也提及大佛的鑄造。歷史介紹之後，文中寫出，奈良域內有一個由八世紀末保存至今的「木造倉庫」（wooden magazine），存放皇家的各種物件。作者言，木造建築與內存之物能保存如此之久，已經相當可貴，更何況其內存有一份清單（inventory），可供確認最初置放於此的物件。接下來，文章再提到「大佛之寺」（the temple of Daibutz）舉辦展覽會之事，以及作者於參觀時的所見所聞。為使西方讀者了解，作者還頗費篇幅地解釋，雖然歐洲各地也可見到種種珍藏，但物件卻未必能確定為真品（genuineness），也未必可知明確日期（exact date），而觀者於奈良展覽會所見之物件，卻因履歷清楚而顯得不凡。他還打了比方，讓讀者想像，若是有一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8-814）的珍寶庫，甚至還附有清單，保存至今，有多麼難得！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作者頗為關注文物的來歷，文中並無提及「正倉院」一詞，而是稱之為「奈良儲藏庫」（Nara repository）或「皇家倉庫」（royal

52 有關日本政府贊助《日本週報》始末，請見：楠家重敏，《ジャパノロジーことはじめ：日本アジア協会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17），頁 32-33。

53 鈴木廣之，〈明治期の正倉院——宝物の調査、展示、評價〉，頁 3-19。

magazine)。即使文中簡述奈良時代歷史時曾提到大佛的鑄造，並且展覽會場也在東大寺，但作者似乎完全不知正倉院與東大寺的關聯。此點將於後文討論。

文章記述與「奈良儲藏庫」相關的展品有如下的物件：屏風、圖畫、書籍、雕塑、面具（數量龐大）、陶器、玻璃器、銅碗與碟、湯匙、有如套環遊戲（quoits）般大小的圓餅狀肥皂塊、龜甲作的搔背器、珠子與裝飾物、鈴、各種武器和工具、衣服、帽子，以及一些無法描述的物件。⁵⁴ 作者寫著，大部分的物件可能有外國淵源（foreign origin），且主要為中國。此處「外國淵源」一語，並沒有明確寫出是外國製造，或是仿製外國樣式。

作者繼續對部分物件作更詳細地評述。他寫著，八世紀正值唐代（A. D. 620-907）（年份為原文所附）中期，因此藏品中的書籍與圖畫，可成為研究中國美術（art）與文學（literature）的資料。有些陶器（pottery），相當讓人驚訝，因為它們看來像是印度或波斯樣式，而非中國。有一個約一英尺高的白玻璃水瓶（a jug or ewer of white glass），特別讓人興奮，八世紀竟然有這樣的東西！此外，有些中國的書寫用紙，保存如此之好，有如剛剛製作出來。筆者推測：《日本週報》作者所謂的白玻璃水瓶，可能即是〈會場第三區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第六號（圖3）上欄中，附簡單插圖的「假水晶水瓶，高九寸一分」。⁵⁵ 有關這件今日稱為《白琉璃瓶》的作品，本文之後仍會討論。⁵⁶ 至於作者感到驚訝的紙，較難明確比對，但今日知道正倉院藏品確實包括未使用的紙，且數量有數百張之多。⁵⁷

54 依本刊匿名審查人建議，報導使用的英文原文應列出，使讀者清楚作者如何描述這些品類：“Amongst the curiosities belonging to the Nara Mikados of the 8th century may be mentioned, screens, pictures, books, sculptures, masks, of which there is a very large collection, pottery and glass, copper bowls and dishes, spoons, soap (!) in large round cakes the size of quoits, tortoiseshell back-scratchers, beads and ornaments, bells, weapons and utensils of various kinds, dresses, hats and nondescript articles.”

55 「假水晶水瓶，高九寸一分」，見（明治）〈會場第三區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錄〉（第一回奈良博覽會B）第六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錄：明治四年—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582，第208項。

56 《白琉璃瓶》，中倉，圖版：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66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4），頁114-115，展件56。

57 正倉院藏品中包括未使用的紙，如「色麻紙」（中倉）有數百張，「繪紙」（中倉）、「吹繪紙」（中倉）各有數十張，見：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62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0），頁104-109，展件58-60。

綜觀《日本週報》報導的書寫方式，有諸多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作者有意聯繫歷史資料與實存之物。第二：強調此批物件時間之早，且對物件履歷的可靠性，提供說明。第三：提示了此批實存之物的豐富意義，特別是物件的多樣品類，以及可能的外國淵源。

雖然是一篇博覽會報導，且於文章後半部也提到了一些產品販售的訊息，但前半篇幅，顯示作者意識到，奈良博覽會除了實用或商業方面的價值之外，更具有文化價值。作者以相當長的篇幅，介紹了奈良時代的歷史，便說明了眼中所見，並不只是一件一件精美的古董，而是認為這些物件有更深刻的知識向度之意義。作者關注這些物件與歷史之間的關聯。這樣的聯繫，具有雙向的意義。知曉歷史背景，可以更加瞭解個別物件。相對地，一件一件實存的畫作、器物等等，也能充實歷史概念的內涵，甚至成為歷史的主體。

實存之物與歷史概念之間的相互印證，更因實存物件的時間極早，而備顯珍貴。十九世紀後期於日本生活或旅行的外國人，或不難看到江戶時代的物件，也可由那些物件了解部分的日本歷史。然而，八世紀的物件，比起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江戶物件，珍稀之程度不言可喻。此篇報導之作者，提及了奈良時代，更提到了中國唐代。並且，為了讓西方讀者，包括某些對於東亞歷史可能不熟悉者，更深切地感受到這批物件的不凡，作者還類比了活躍於八至九世紀初的查理大帝，中古歐洲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以便西方讀者能於歷史的時間軸上有所對應。

與時代極早相關的問題是，要如何確定這批物件年代的真實可信？雖然這是一篇新聞紀事，而非學術文章，但作者有意識地提及一些重要佐證。這些文字，顯示作者並非仰賴難以捉摸的傳聞，也不是主觀認為物件本身具有古意，而是指出查證履歷的明確方法。他提到這個木造倉庫屬於日本天皇，且自古以來每隔數十年被盤點檢查一次。據今日學術研究，實際上，正倉院物件自古以來並非數十年必然盤點一次，有時相隔甚久。⁵⁸但英文報導作者提及這項資訊，很可能是展覽當時關注的話題。文中更強調有一「物件清單」。因為清單的存在，所以即使有八世紀之後的物件被放入，也可透過清單來驗證是否為原有之物。今日，我們有了更多的資訊。清單指的是寫於天平勝寶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的《東大寺獻

58 飯田剛彦，〈正倉院の歴史〉，頁9-17。

物帳》，又稱為《國家珍寶帳》。⁵⁹ 依現在學界所知，清單上列有 600 多件物件，能確實與現存之物對上的有百餘件。⁶⁰ 《日本週報》的作者，顯然沒有這樣明確的資訊，很可能當時的日本學者也尚未有如此清楚的認知，畢竟，1870 年代有制度的整理編目工作尚未開展。不過，文中提到令人驚訝的白玻璃水瓶時，作者接著寫，有些人說此件並不在清單之中，也有些人說有。這段書寫，顯示作者有興趣探討實物與清單的對照，也顯示當時人們不僅關注物件本身，也開始討論作品履歷的議題。雖然文章並無提供最後的答案，但這段文字反映的是一種藝術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實存物件與文獻紀錄加以比對，以確定物件的來歷。

有關「皇家倉庫」、「物件清單」等資訊，顯然不可能憑空知曉，應該是由展覽主辦方或其他日本人士提供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通篇文章不見「正倉院」一詞，更沒有提到正倉院與東大寺的淵源。雖提及「物件清單」，卻不知此清單實為由光明皇后（藤原光明子，701-760）署名的獻物帳。皇后於聖武天皇去世之後，將「國家珍寶」獻給東大寺。《日本週報》的報導雖重視歷史，卻顯示了與今日對正倉院物件認知的差異。雖原為皇室所有，但既已獻給東大寺，那麼，這批物件與其說屬於皇室，毋寧應說屬於東大寺才是。並且，獻出大量珍寶給東大寺，也表示當時日本皇室與佛教文化的深刻淵源。為何《日本週報》的作者對此重大歷史訊息毫無所知？合理的推測是，當時的展覽主辦方，難以處理皇室與佛教的歷史淵源的問題，而刻意迴避提及這些重要的資訊。

除了對於履歷驗證的關注之外，《日本週報》的報導中，特別值得注意的要點，是列出了正倉院藏品的多樣類型，並提及可能的外國淵源，可見英文報導者頗關心這些物件展現的國際交流議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週報》所列，不僅品類繁多，且順序與前述〈會場第三區大仏殿內正倉院寶庫御物陳列目錄〉所列，並不相同。筆者認為，此報導之作者對品類的書寫，雖未以嚴格的架構呈現，但羅列之品項似乎更具邏輯性。作者排列時，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顯出位階，也可能反映出作者的知識系統脈絡。在此文中，首先列出具有圖像的平面和

59 關根真隆，〈正倉院遺宝伝來の記〉，收入關根真隆，《新編名宝日本の美術 第5卷 正倉院》（東京：小學館，1990），頁 102-137。《東大寺獻物帳》之圖版及簡要說明，亦可參見：飯田剛彦，〈東大寺獻物帳と法隆寺獻物帳〉，圖 5，頁 46-47。

60 除了《國家珍寶帳》這份最著名的清單之外，尚有同樣出於八世紀中期的《種種藥帳》、《屏風花氈等帳》、《大小王真蹟帳》、《藤原公真蹟屏風帳》。關根真隆，〈正倉院の記〉，收入關根真隆，《新編名宝日本の美術 第5卷 正倉院》（東京：小學館，1990），頁 61-67。

立體物件，以及文字資料，即：屏風、圖畫、書籍、雕塑、面具。這些物件排在前面，似乎也呼應了繪畫、雕塑，文字等，在西方的知識系統中位階相對較高。接下來是較精美的工藝品：陶器、玻璃器、銅碗與碟、湯匙。一些日用雜物與珍奇之物則排在後面：肥皂塊、龜甲作的搔背器、珠子與裝飾物、鈴、各種武器和工具、衣服、帽子，以及一些無法描述的物件。筆者並不是指作者已經做了嚴格的分類，而是認為書寫的過程中，作者的排序，多少有位階高下之分，且與西方知識系統有關。其中，不乏難以明確分類的物件。比如：面具，因與人類的面容有關，多少具有人像雕塑的性質，但也可以歸為工藝品，因此排在雕塑和陶器之間。碗、碟、湯匙，可以是工藝品，也可以是日用物。此外，日用與珍奇之物的概念並非完全互斥。作者在肥皂一詞後面還加了一個驚嘆號（soap！），或許意味著：雖然肥皂是尋常之物，但來自古早寶庫的肥皂，確實讓人驚呼連連。在此補充說明，前述奈良博覽會目錄中，確實列有「古製シャボン」（古製肥皂）一項，不知確指何物。⁶¹ 由於英文文字中有提到如套環一般的圓餅狀，筆者猜測是否實為套成一串的圓形「膈蜜」（蜜蠟）（圖 4-1、4-2）。⁶² 暫記於此，就教於大方。

作者除了列出多樣的物件，對部分物件有較詳細的描述，並提到它們可能來自中國、印度、波斯等，甚至明言部分物件，可作為研究唐代美術與文學的材料。當今學者指出，正倉院物件中，依銘文等明確資料而可知製造地的，數量很少，多數物件皆需多方比對研究。⁶³ 今日，我們已確知正倉院藏品與唐文化、絲路文化有密切關連。然而，在一百四十餘年前的 1875 年，嚴肅的研究尚未起步，但《日本週報》的作者，已經意識到了奈良展覽會上這些精美物件，可能是見證古代文化交流的實存之物。這也反映出，十九世紀後期，歐美人士對探究世界史、人類文明交流史的高度興趣。

61 如（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二號，第 73 項為：古製シャボン，見（明治）〈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二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 580。今日多寫為：シャボン。

62 第 69 回正倉院展曾展出蜜蠟，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頁 26-27，圖版 7-1、7-2、7-3。

63 關根真隆，〈正倉院宝物の製作地の問題〉，收入關根真隆，《正倉院への道：天平美術への招待》（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 193-220。

四、英國設計師卓瑟筆下的正倉院寶物

1877年，由於明治初期的重大內戰——西南戰爭——爆發，奈良博覽會並無舉行。⁶⁴然而，依現有資料看來，當年仍有籌畫展覽，部分古物存於東大寺境內的展場之中，供特定人士觀覽。1876年十二月來到日本的英國設計師卓瑟，於1877年二月，便於東大寺域內觀覽了原藏於正倉院與其他寺院的古物，甚至得到允許，進入正倉院建物之內。他在日本的所見所聞，記於1882年於倫敦與紐約出版的《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一書。⁶⁵

在探討卓瑟的正倉院見聞細節之前，先簡介此人及與之相關的研究。卓瑟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著名設計師，設計的領域包括建築裝飾、金屬與陶瓷等立體物件、織品及印染品等。西方學者對於卓瑟的評價，聚焦於他在設計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不但有設計樣式與圖案之專長，對各種製品的製作流程也有實務經驗，更以關注世界各地不同的工藝製作著稱。⁶⁶而日本學者對卓瑟的研究，則集中在此人1876年十二月至1877年四月的日本之旅。⁶⁷卓瑟到日本的主要原因，乃受英國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館長之命，帶來一批歐洲的工藝作品，致贈日本。⁶⁸赴日之前，他先到美國費城參加1876年的世界博覽會，並於此地與幾位日本官員交流。由舊金山至橫濱的船上，也與數位日本官員同行。⁶⁹

64 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曾小楚、伍秋玉譯，《明治天皇：睦仁和他的時代1852-1912》(*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上冊(新北：遠足文化，2019)，頁384-400。

65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66 有關卓瑟生平及專長，請參見：Widar Halén, *Christopher Dresser: A Pioneer of Modern Design*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90).

67 卓瑟日本之旅的任務及相關背景，請參見：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頁12-18。亦請參考此論文列出的研究文獻。

68 卓瑟所帶之贈品，依紀錄有315件，現存63件。佐藤秀彦，〈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来日と英国の寄贈品〉，《郡山市立美術館研究紀要》，2號(2001)，頁11-51；山田陽子，〈サウス・ケンジントン博物館と日本：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運んだ1876年の寄贈品選定基準について〉，收入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14-23。致贈品的部分圖版，參見同書，頁43-55。

69 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40-42。

一到日本，卓瑟便受到日本官方的歡迎，特別是得到當時握有大權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1830-1878）的支持。⁷⁰日方欣然接受致贈品，並安排卓瑟面見天皇的殊榮。除了榮耀之外，日本政府委託卓瑟到日本各地進行工藝品的調查。途中有日本人員同行協助，寫下報告書。⁷¹而卓瑟另行寫下《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一書，於數年後出版。現有的日文研究中，重建了卓瑟與日本人士間的人際網絡，也追索當年由英國帶來的致贈品之詳細品目。⁷²2019年福島縣郡山市立美術館的展覽會中，特別關注卓瑟曾親見正倉院藏品一事，並嘗試推論當年所見之品項。⁷³不過，如後文所提，筆者對比卓瑟之書，發現有些品項的尺寸仍有疑問，無法完全確定。換言之，卓瑟親見正倉院藏品之事，雖已有學者關注，但因既有論文篇幅不長，仍有許多待探討的空間。除了英、日文研究外，2020年有謝宜君之碩士論文。⁷⁴此文主要探索卓瑟書中兩百餘幅插圖的特性，對於卓瑟與正倉院的關係評價不多。

雖然卓瑟 1876 至 1877 在日本的旅程，以調查工藝品為主要目的，但由《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一書看來，他的旅程活動相當豐富多元。參訪之處除了陶瓷、金屬器、織品等工藝製造處所之外，還包括了多處寺院、神社、古蹟。特別的是，某些場域是首次允許外國人參觀，包括奈良的正倉院建物內部。⁷⁵由此可知，所謂工藝品調查一事，並沒有被狹義地限制。卓瑟書中所寫也多有與工藝品未直接相關之事，呈現他對日本文化的廣泛關心。由另一角度看，1870 年代，尚未有完整的日本美術史書問世，諸多古代物件的分類、價值、定位，都尚未明確化。卓瑟是在無權威參考資料的情境下，寫下他的意見。

70 大久保利通，當時為第五任內務卿，任期 1874 年 11 月 28 日至 1878 年 5 月 15 日。

71 日方由坂田春男、石田為武陪同，旅行費用也是由日本支付，見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頁 60；（明治）石田為武，《英国ドクトルドレッセル同行報告書》（出版商資訊不詳，1877，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然此書封面內頁印有「東京教育博物館印」字樣，全文可參見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National Diet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網頁。

72 相關資料已於注 68 提及。

73 佐藤秀彦，〈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の宝物調査〉，收入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6-13。並參見同書，頁 135-136。

74 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

75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vi-vii.

參觀正倉院之日，卓瑟如此寫著，「1877年2月3日是我生涯中偉大的一天」。⁷⁶他並表示，對於歐洲人來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古物博物館，比起奈良的珍稀收藏，更具啓發性（*instructive*）。他以問句的方式，表達驚嘆。書中寫著：在哪個地方，可以見到千年以前的印花布料和織品，保存如此之好，讓人覺得彷彿它們當天才剛由印度、波斯、中亞、中國與日本的工匠之手作出？在哪個地方，可以見到埃及、印度、中國、日本藝術之間的奇特連結（*strange connecting links*），如同我們在此所見？⁷⁷

強烈地表達讚賞之意後，卓瑟詳述他見到正倉院物件的前後經過。在進入細部討論之前，有必要說明為何卓瑟是第一個獲准進入正倉院建物內部的西方人。卓瑟之所以被允許進入正倉院建物，與其訪日時機頗有關聯。1877年春季，明治天皇進行關西之旅。他在二月五日出生神戶、京都間鐵道車站巡視儀式，二月七日參拜奈良附近的天皇陵，二月九日參觀東大寺與正倉院。⁷⁸卓瑟在關西的日期，與天皇多有重疊。或許爲了準備天皇的參觀，來自中央政府的官員需要預先檢視正倉院的物件與建物，因此也允許卓瑟前往一覽。卓瑟深知此爲特殊的榮耀，於書中標明，此事乃由大久保利通請求，獲天皇首肯，方能成行。⁷⁹以下，筆者擬整理卓瑟書中所記，並嘗試分析其書寫之意義。

二月三日，卓瑟先被引導到興福寺參觀，接著走了大約四分之一英里（約400公尺）路後，到達東大寺。⁸⁰他先觀看東大寺內的佛像，再與町田久成會面，由他陪同觀看「偉大的古物藏品」（*the great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可注意的是，卓瑟對於他所見的藏品，僅以「偉大的古物藏品」，或是「奈良的古代物件收藏」（*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objects in Nara*）稱之，並沒有提到「正倉院」一詞。⁸¹此外，伴隨參觀的町田久成之背景需要注意，他是薩摩藩1865年派往英國留學的藩

76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89.

77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101.

78 唐納德·基恩，《明治天皇：睦仁和他的時代 1852-1912》（*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上冊，頁384-386。

79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86.

80 卓瑟並沒有寫出興福寺之名，但因他的描述中提及南圓堂（*nanyen-do*）、東金堂（*tokin-do*）、西金堂（*saikin-do*）、北圓堂（*hokuyen-do*），可知是興福寺。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89-93.

81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4.

士之一，1867年曾參與巴黎萬國博覽會，同年返回日本，參與政府的外交事務、博覽會、博物館、文物保存等工作。壬申檢查時，他是主要的調查官員之一，此後，持續負責古物調查及博物館建設的工作，並於1882年出任首任東京帝室博物館館長。⁸² 町田不但是一位高級官員，更是博物館事務的主要推動者，他與卓瑟一同檢視，顯示這次的參觀並非泛泛的觀光之旅，而是很可能有觀念上的交流。

卓瑟描述，他們檢視的第一批物件，陳列於東大寺大佛殿之迴廊（corridors），置於有玻璃門片的松木櫃子內。當他表示對某些物件感興趣時，町田便同意取出讓他仔細觀看。卓瑟提到一些物件，有些於文章中有標出原藏地，有些則無。文中提到有來自法隆寺（Horiu-zi）的刀，為1300年前之物。此外，他特別感興趣的作品，包括一個有雙龍及獅鷲（griffin）裝飾的銅鑼，以及鼠形油燈。這裡，他的紀錄有些誤解，前者應是來自興福寺的銅製《華原磬》，後者則是出自長谷寺，但卓瑟似乎以為都出自奈良寶庫。⁸³ 他對於鼠形油燈興趣很高，用了很多的篇幅描述，並畫出簡圖，附於書中（卓瑟書插圖28）。這個油燈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燈油會由老鼠的口中流出，是一個機巧的裝置。不過，卓瑟稱此作品出自於「奈良寶庫」（Nara treasury），並不知此原為長谷寺所藏。依今日所得資料所示，卓瑟於東大寺的迴廊所見，應屬奈良博覽會中其他寺院的展品，而非出自正倉院。1877年二月中旬西南戰爭爆發，博覽會並未舉行。不過，部分展品可能已提早預備，存於東大寺域內。我們可以推測，卓瑟當日所見之物甚多，對於哪些作品確實出自正倉院，哪些出自其他藏處，未及辨明。然而，雖然參觀時間不是很充裕，並不表示他僅是走馬看花。他對於某些個別作品興趣很高，非常仔細地辨識特色，也在書中有詳細的書寫。

卓瑟於書中寫著，看完佛殿中的物件之後，他被引導到距離兩百碼左右的另外一個建物內，見到另一批藏品。⁸⁴ 町田久成告訴他，置於此處的藏品，至少有1200年的歷史。町田並說這些物件不是日本的（not Japanese），但他無法辨明

82 町田久成之生平與主要成就，見：関秀夫，《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2005）。

83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5-97. 2019年郡山市立美術館的特別展覽中，嘗試推測卓瑟當年見到的部分展品，但並無深入的討論，見：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頁100-109。

84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7-101.

許多物件從何而來。有些藏品明顯是中國的、有些是印度的，有些兼有中國與印度的特色，可能是來自西藏或其他位於印度與中國附近的內陸國。由卓瑟此段文字及之後有關個別物件的描述看來，在此所見才是出自正倉院，但他本人並無明確地區別。此段文字敘述，可見町田和卓瑟都認為這批物件中有外國來源，但這意指風格或樣式為外國式，或外國製作，並不清楚。我們也無法區辨，書寫於文中的每一件物件評價，是卓瑟個人的想法，或是參酌了町田的意見。雖然卓瑟是因奈良博覽會的籌辦，以及明治天皇訪問關西的行程等因緣際會，得以見到正倉院之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與他一同觀覽的，是一位於明治維新前便曾留學歐洲，且於明治初期掌管文物調查、博物館事務的中央政府上層官員。町田久成與卓瑟共同檢視物件，討論的主題聚焦於物件與外國文化的關聯，而非空泛地閒談。

卓瑟於文中開始描述在此處所見的偉大收藏（magnificent collection）。他並無分門別類寫出所見之物，雖然同類的物件大致放在同一段落，但並非嚴格有序的安排。比如，銅鏡與銅盤便放於不同段落中。這是否反映出當日參觀時，物件排列的順序，目前並無資料可進一步探索。

文中首先寫出的是織品，卓瑟寫著，這是他最感興趣的品類。他認為這些織品保存得極好，而有些樣式近於中古歐洲或義大利的風格，讓他十分驚訝。接著，他更具體地描述一件織品，上面有多個圓形阿拉伯風裝飾，圓形內有獅子兩兩相對的圖案，外圍還有其他小動物，織品主要色彩是紅與暗黃。他也提到了一些印染的棉布。以及一件有白色獅子圖案的皮革。卓瑟還提到了有些作品讓他聯想到 *L'Art arabe* 一書。雖然沒有附上清楚的書目，但推測指 Émile Prisse d'Avesnes (1807-1879) 1869 至 1877 年間出版，附有大量圖版之作。⁸⁵ 卓瑟本人在世界各地所見的實物，以及十九世紀後期帶有大量圖版的出版品，皆有助於他實際比對各式圖案外型，思索彼此間可能的關聯。

卓瑟感興趣的還有一件琺瑯器（cloisonné enamel），有金屬線凸起，內填的琺瑯料下凹，表面並未被修平。由這些描述，可見他對於部分物件的細節，尤其是某些足以反映製作細節的外觀，相當留意。他接著提及多個銅鏡，包括圓形與方形，有些是中國的，有些是日本的。不過，文中並未沒有寫明，所謂中國或日

85 Émile Prisse d'Avesnes, *L'Art arabe d'après les monuments du Kaire* (Paris: A. Morel et Cie, Libraires-Éditeurs, 1869-1877).

本的銅鏡，是町田告知，或是他自己的意見。除了描述一些銅鏡上所見的圖案之外，因為某一鏡子附有一貼上絲織品的鏡盒，他又轉而描述上面的圖案特色。他認為上面的裝飾圖案，「介於波斯風與某些前拉菲爾派圖畫背景上的平面裝飾」。⁸⁶ 近期出版的展覽書中，推測卓瑟所見為《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及其鏡盒《八角高麗錦箱》，但筆者認為織錦顏色與卓瑟所寫的綠色底並不同，還有待研究。⁸⁷

接下來一段，卓瑟寫著，瓶的樣式很多，包括希臘風格、阿拉伯風格、中國風、日本風。⁸⁸ 其中有一個玻璃水瓶，他仔細描述，並附上插圖（卓瑟書圖 29，本文圖 5）。⁸⁹ 他指出這個水瓶的注口造型細膩，把手形狀講究，玻璃質地粗而有非常淡的藍綠色。日本人不知這個水瓶由何處來，卓瑟則認為是早期阿拉伯作品。這個玻璃瓶，很可能即是《日本週報》作者印象特別深刻的作品。

卓瑟記下的其他器物，包括一比例修長的金屬壺，有波斯特色的形狀。他也見到了作為武器的三叉戟、部分有拼接工藝，部分為漆藝的盒子、一個十六吋大的銅盤，盤中有浮雕的雄鹿、雕有蛇及想像動物的白色大理石石雕（他認為是印度風的作品）、繪有黃色鵝和花朵的白色陶器、頂端為綠色而旁邊有橫紋的陶碗等。此節最後又回到與織物有關的物件。卓瑟描述他見到數量頗多的短毛，似乎是尚未製成成品的駱駝毛。

除了具體寫出所見之物的外型特點之外，卓瑟於文中反覆強調，這些物件存於日本已經至少有一千兩百年。最後，給予總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博物館，能夠見到如此有啟發性的物件，不但保存狀況極佳，更具體呈現了印度、波斯、中亞、中國、日本等特點，因此可以顯示這些文化之間的關聯。

看完藏品之後，卓瑟被帶領到正倉院建物前，並獲准入內參觀。這裡我們可

86 “The pattern of this fabric is in character between Persian and that kind of flat ornament which is general as the background of pre-Raphaelite picture.”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9.

87 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頁 108。《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南倉），鏡盒為《八角高麗錦箱》（南倉），更清楚的圖版，見：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58 回正倉院展》：展件 28、29，頁 52-57；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9.

88 文中使用 Chinese、Japanese 等字，筆者認為是指風格而言，而非認定是中國或日本製作。

89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fig. 29, 100. 圖版說明：「玻璃水瓶的概略圖，保存於奈良的天皇寶物庫內。無疑是一件早期的阿拉伯作品。」

以注意到，卓瑟是在另一空間檢視物件後，再到正倉院建物，可見藏品（或部分藏品）已被移出。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自始至終，卓瑟並沒有寫出正倉院之名，亦無說明正倉院與東大寺的淵源，而是稱之「奈良的古老木造建築」（the old Wooden Building in Nara）。書中有一插圖（卓瑟書插圖 30，本文圖 6），圖版說明如下：「奈良的古老木造建築，其內保存了一千兩百年的天皇寶物。屋頂被更新過幾次，但建物的其他部分是原來建造的。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築。」⁹⁰

綜觀卓瑟的書寫，筆者認為有以下特色。第一點：卓瑟的文字，頗能清晰地描述的外型，因此可與讀者就這些物件的外在特點進行溝通。他寫出物件的材質、形狀，色彩、圖案樣式等，讀者接收到的訊息，相對來說較具體，而非僅是看到許多古老物件的模糊資訊。他對某些物件的描述尤其仔細，比如，他寫著有一水瓶的注口造型細膩，把手形狀講究，玻璃質地粗而有非常淡的藍綠色。書上還附上插圖。由於有這些外觀特色的清楚描述，當他進一步寫出推斷這個水瓶是早期阿拉伯作品時，讀者可以了解他的判斷根據。卓瑟書中提到的水瓶，可推知是著名的《白琉璃瓶》。（圖 7）⁹¹ 在印刷與數位技術飛躍進步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從品質較佳的複製圖版中，確實可由透明的水瓶上，看到極淡的藍綠色。對於研究者而言，玻璃器的色澤，牽涉到使用配方的細節，也關乎產地，是極為重要的資料。而百餘年前的英文書寫，證明當時的作者與今日研究者有相近立場的關注。

不過，筆者並非指卓瑟所記，已經如嚴格的學術研究般準確。由他的紀錄，追索當日所見物件，仍有些品項難以明確地確認。比如，他描述一件織品上有多個圓形阿拉伯風裝飾，圓形內有獅子兩兩相對的圖案者，色彩主要是紅與暗黃。依文字所寫，此件或有可能是《紫地狩獵文錦》（圖 8）或《紫地鳥獸連珠文錦》。⁹² 這些名稱為紫地的織品，實際上呈現紅色調，連珠花樣則是暗黃色，但動物的種類似乎不完全與卓瑟所記相符。而今日著名，有圓珠形裝飾，圓圈內有狩獵者與

90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fig. 30, 102. 有關正倉院建物的書寫，101-103。

91 《白琉璃瓶》，中倉，圖版：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6 回正倉院展》，頁 114-11，展件 56。

92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98. 《紫地狩獵文錦》，北倉 182 《東大寺屏風裂》之第 12 號，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頁 222-226。《紫地鳥獸連珠文錦》，南倉，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4 回正倉院展》，頁 64，展件 41。

獅子的，實為法隆寺的《四騎獅子狩文錦》，並非正倉院藏品。⁹³ 實際情況如何，仍有待釐清。另外，他記有一個十六吋大的銅盤，盤中有浮雕的雄鹿。盤中有雄鹿的盤，有近期展覽書指出可能是出自南倉的《金銀花盤》（圖 9-1、9-2）。⁹⁴ 盤中雄鹿雖是明顯特徵，但此件直徑 61.5 公分（24.2 吋），與卓瑟所記的十六吋並不相符，是否是卓瑟誤記，仍留有疑問。⁹⁵ 總之，筆者並非指卓瑟所書完全無誤，而是認為他的記述與推論，顯示視物件本身外觀特性，而非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傾向。

第二點，卓瑟強調這批收藏的古老、品類眾多、保存良好，尤其重要的，非常具有國際特色。除了對個別物件外觀、紋樣、材質的描述之外，比起《日本週報》的報導，卓瑟之文對於物件的數量與多樣性的記述更為詳盡，特別是提及銅鏡及染織品的龐大數量。今日已知，存於正倉院北倉之鏡有 18 面，南倉則有 38 面，型態、紋樣各異。⁹⁶ 卓瑟雖然只有簡短描述，也可讓讀者知曉，此批收藏中並非只有一兩件特異之作，而是有數量龐大的物件可待探索。

在風格方面，綜觀織品與器物，卓瑟列舉了希臘風格、阿拉伯風格、波斯風、印度風、中國風、日本風等意見。卓瑟之文，即使對於個別物件的風格推論，未必與今日之學者完全一致，但某些樣式涉及波斯或阿拉伯裝飾母題的討論，方向確實引人注目。1200 年之前的物件，不但可驗證奈良日本與中國唐代間的交流，甚至能體現西亞與東亞之間長程的交流，想必讓當時的讀者相當興奮。十九世紀的歐美人士，對於世界史有高度興趣。這批奈良寶物，最吸引人的不僅是精巧絕倫，更是作為古代文化交流的實證。特別是我們考慮到，同樣能提供西亞與東亞交流實證的文物，有賴二十世紀前期史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等西

93 《四騎獅子狩文錦》，國寶，現被認定為中國唐代作品，呈現暗黃色調，無明顯之紅色。圖版見：法隆寺編，《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仏教文化》（奈良：法隆寺，1989）：圖 124-125，頁 140。

94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100；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頁 108。圖版亦見：《金銀花盤》：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頁 90-92，展件 29。

95 佐藤秀彥文指出幾件卓瑟所見的正倉院藏品，但筆者比對卓瑟敘述，有些細節並不完全相符，但佐藤文中並無說明不符之處。佐藤秀彥，〈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の宝物調査〉，頁 6-13，特別是頁 8-9。

96 中川あや，〈正倉院北倉に納められた鏡〉，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頁 124-126。

方探險家的活動及著作發表，卓瑟於 1882 年出版的書籍中提供的資訊，便顯得有獨特的價值。日本學者也指出，二十世紀的研究者，非常重視正倉院染織紋樣的世界性。⁹⁷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正倉院物件尚未被系統化整理的 1870 年代，觀者已經相當關心由物件樣式與裝飾花紋反映出的國際交流之議題。

第三點，卓瑟文中沒有論及書畫作品，此事也值得關注。對比《日本週報》報導，屏風、圖畫、書籍等，是卓瑟沒有討論的品類。由於年度不同，我們無法得知 1875 年展出的物件，與 1877 年卓瑟所見是否相同。我們也沒有其他資料可得知卓瑟當時看到哪些藏品，卻省略不寫。不過，由卓瑟書中其他章節的內容看來，他確實缺乏對書法、繪畫的評價，這很可能反映個人的興趣取向。如前所述，雖然卓瑟負有調查工藝品的任務，但所聞所見並不受侷限，書中所寫也有些不與工藝品直接相關的內容。然而，今日正倉院最著名的作品，如《墨畫佛像》（又稱《麻布菩薩》）、《紫檀木畫槽琵琶》等，被視為探索八世紀東亞繪畫的關鍵資料。⁹⁸ 這方面的議題，似乎不在卓瑟關注的範圍。

第四點，如同《日本週報》的作者一般，卓瑟不知此收藏原屬東大寺正倉院。卓瑟以「奈良的古老木造建築」稱正倉院，並認為「偉大的古物藏品」自古以來屬於皇室所有，似乎完全不知它們與東大寺的關係。陪同卓瑟參觀的日本人員，町田久成，應該不致於不了解正倉院寶物與東大寺密切相關的歷史，為何不給予清楚的說明呢？合理的推測是，雖然日本人員或許未必有刻意隱藏天皇與佛寺淵源的企圖，但顯然沒有給予完整的資訊，以致卓瑟完全不知正倉院藏品的明確歷史。這與今日正倉院展中，必然清楚說明皇室獻納東大寺的史實，形成強烈對比。而這種情況，或與明治初期的「神佛分離」政策不無關係。雖然歷史上，天皇與佛教、神道信仰皆有密切關係，但明治初期為了政治上的原因，卻選擇強調天皇與神道的關聯，有意模糊化佛教與佛教寺院於日本歷史上的關鍵地位。⁹⁹

97 尾形充彥提及，日本最早於學術論文中論述染織紋樣與西方文化關聯的，是 1888 年三宅米吉之文，但此文並沒有被學界認可，見：尾形充彥，〈正倉院の染織文様の世界性〉，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4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2），頁 116-119。

98 《墨畫佛像》，南倉 154；2019 年東京博物館「正倉院の世界展」，展件 25，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頁 80-81。《紫檀木畫槽琵琶》，南倉 101-102，2019 年東京博物館「正倉院の世界展」，展件 71，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頁 152-153。

99 相關議題請參考：高木昭作、末木文美士，《日本文化研究：神仏習合と神国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5），頁 202-216，以及 Helen Hardacre, *Shintō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五、綜合討論與結語

本文整理了 1870 年代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藏品展示的相關資訊、1875《日本週報》的英文報導、1877 年英國設計師卓瑟親見正倉院物件的心得，目的在於呈現 1890 年代日本官方管理制度漸趨明確之前，正倉院的古代藏品已經透過一次次的觀看與紀錄，開文物於現代社會中意義轉化之先聲。誠然，本文討論的數種資料——新舊並陳，未臻成熟設計的奈良博覽會、印製簡素且未經精密考慮排序的日文目錄，以及內容尚存多處不明，甚至有錯誤資訊的英文報導——今日看來，無一可被視為產生巨大影響的里程碑。然而，這些明治最早期的展示活動與書寫，卻是古代文物意義轉換脈絡的開端。透過這些活動與文字，我們已經可以觀察到展示籌辦者的企圖與限制、觀看者的關注趨向與其中反映的知識背景，以及日本與西方人士於明治初期的交流實況。

就藏品公開的規模而言，由目前掌握到的第一回與第二回目錄，可知展品品項分別多達兩百項或百項以上，且種類涵蓋了多樣的形式與材質。英文報導也應證了展品多元的特色。觀看人數之多更是讓人驚訝，第一回高達十七餘萬，四回總計有數十萬人次。英文報導進一步點出前往觀看的外國人士頗多。然而，由 1880 年代之後的「曝涼」參觀，每日僅限 20 人一事看來，日本政府並不認為盡速向大眾公開，是管理正倉院藏品的第一要務。相對地，1880 年代之後，管理工作更為著重整理與修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卻意識到正倉院藏品對外國觀者有相當的吸引力。1880 年代之後的資料顯示，外國人士可能透過申請於「曝涼」期間參觀。而國外政治地位崇高者訪日時，甚至能作特別的安排。¹⁰⁰ 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如《日本週報》報導、卓瑟的書籍等，縱使未使國際人士完整地瞭解，也有助於正倉院藏品於世界上聲名遠播。

無論是《日本週報》1875 年的報導，或是卓瑟書寫自身 1877 年被特別允許的觀看經驗，皆是寫出親眼所見之物。這與由文獻資料探索異國之歷史文化，本質上頗為不同。若無奈良博覽會的展示，便不可能有觀看的契機。並且，由於展品數量極多且含括多樣類型，縱使尚未經嚴謹研究，仍能藉由觀看物件本身的材質、樣式、製作特色等，認可其非凡的價值。特別是對於某些曾親見世界其他地

100 田良島哲，〈大正期の正倉院拝観資格の拡大と帝室博物館総長森鷗外〉，頁 30-31；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頁 106-107、111。

區物件的西方觀者來說，正倉院之物絕非僅是新奇或精巧，材質反映出的原料產地，製作技術、樣式特色與其他文明物件的相近或相異，皆有助於追索八世紀時的國際文化交流。觀看與書寫未經明確定位之物，正是知識探索的關鍵開端。

《日本週報》報導之作者與卓瑟，皆具有這樣的觀看之眼，他們的書寫也呈現關心所在。由於篇幅所限，《日本週報》的作者並未仔細討論展覽會上的物件，但光是列出展示物件的品類，囊括了圖畫、文書、各種材質的工藝品及日用品，便十分具體，可使讀者知曉有哪些類型的物件。卓瑟則以大量的篇幅，寫明物件的外觀特色，使有興趣的讀者更能了解物件的細節。描述外觀，而非強調觀者感受的書寫方式，使得英文讀者得以具體掌握物件本身的特質。

依今日學界所知，正倉院所藏物件種類極為豐富，且豐富性展現在各個不同的面向。就品類而言，包括書法、繪畫、金屬器、陶器、漆器、木器、染織品、香料藥材等。就用途而言，有文書、家具、文具、樂器、戲劇用具、娛樂用具（如棋盤、投壺）、佛具、其他儀式用具、武器、服飾品、飲食器、日常用品。就物件之樣式，以及由樣式而推知的產地而言，來源可能包括西亞地區、中國、印度、日本等。¹⁰¹ 由於物件種類太多，以至於似乎沒有一種分類方法，可以完美地表述。即使於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學界仍未完整地了解正倉院藏品。然而，種類豐富多元，以及來源的國際化等特點，在這兩篇 1870 至 80 年代初的英文報導中，作者已經充分顯示對此關注的意識。而書寫的方式，也可引導讀者作出方向相近的關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週報》的報導與卓瑟之書，都強調了履歷驗證。他們說明這些物件為 1200 年前之物，並非僅憑傳聞，而是提到原本儲藏的寶庫仍然存在（卓瑟甚至親自到過建物內部），以及寶庫之內有一「清單」。這樣的書寫方式，意味著他們十分在意物件是否出於可靠來源。在研究的方法學上，寫作者顯然意識到，此批物件有明確的履歷，因此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

然而在履歷的議題上，讓人驚訝的是，「正倉院」之名，在這些英文報導中的湮沒。如前所述，英文文中，以「奈良的古代物件收藏」，「奈良時代天皇的收藏」稱之，沒有提及「正倉院」一詞，更沒有提到正倉院原為屬於東大寺的寶物

101 參見：閻根真隆，《新編名寶日本の美術 第5卷 正倉院》，全書。

庫。以今日學界所知，正倉院主要藏品，為光明皇后獻與東大寺之皇室用物，以及東大寺法會用物。¹⁰² 近期更有學者研究指出，《東大寺獻物帳》中的物件，顯示當時選擇獻納之物時，可能參照了《梵網經》、《華嚴經》中的佛教教義。¹⁰³ 明治初期，即使尚未完全釐清藏品全貌，由《國家珍寶帳》篇首之語，「奉為 太上天皇捨國家珍寶等入東大寺願文 皇太后御製」，也可知端倪。¹⁰⁴ 既然「清單」一再被提及，與展覽會相關的日本人士，尤其是如町田久成這樣的有識之士，似乎不可能不知曉基本的內容。那麼，十九世紀的英文報導，為何缺乏這方面的訊息？可能的原因，是主辦單位刻意不去呈現正倉院與東大寺的淵源，以及歷代天皇與佛教的深厚關係。明治初期的文化政策，核心之一是鞏固天皇的地位，已有多位學者論及。¹⁰⁵ 中央政府選擇加強天皇與神道之間的關聯，某種程度上打壓佛寺原有的地位與影響力。雖然明治政府另有其他的作為，調查並保護原屬於佛寺的文物，並無刻意毀棄，但就展覽舉辦單位而言，應該是感受到佛寺文化在當時政治氛圍下地位不明，寧可選擇強調正倉院藏品與天皇的關係，而無意闡明此批文物原屬佛寺的歷史脈絡。

我們並無直接證據，可以說明《日本週報》的報導或卓瑟之書，對於日本政府管理正倉院的政策造成哪些具體影響。亦無資料顯示有多少外國人士因為讀了這些文字，而對正倉院文物產生明確的認識。相對於 1890 年代之後，費諾羅沙、岡倉天心（1863-1913）等人篇幅宏大且更具系統性的著作，1870 年代的英文書寫，重要性似乎難以輕易呈現。然而，筆者認為，這些明治時代早期的短篇書寫，實為強勁伏流。它們帶有新鮮且具前瞻意義的觀點，在官方文化政策未定，本地與國際人士交流方式少有前例可循的情境下，積極地發聲與溝通。假若沒有這些前驅人物與著作，使得西方世界點點滴滴地知曉了日本保存的古代文物，難以想像費諾羅沙、岡倉天心等人的論述可如旋風般地風靡一時。由另一角度看，卓瑟與町田久成討論正倉院一事也值得注意。此事本身似乎沒有造成明確的政策影響，

102 關根真隆，〈正倉院の記〉，頁 61-67。

103 內藤榮，〈正倉院寶物の成立——聖武天皇の宝物、薬物の献納と戒律〉，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頁 6-12。

104 《國家珍寶帳》，高 25.8 公分，長達 1470 公分，列有六百餘項物件，見關根真隆，〈正倉院遺寶伝來の記〉，頁 102-137。

105 代表性論述請參見：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但自 1870 年代以來，日本官方或文化界人士與外國知識人探討文物的情況為數甚多。如本文所述，雙方針對具體實存的作品交換意見，而非表面上泛泛而談的例子並不罕見。¹⁰⁶ 可以推測，明治初期，官方積極與外國人士進行實質的交流，使得日本得以較快速地掌握西方對文化發展的觀點。明治時代後期，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日本無論在國內博物館規劃、國外大型博覽會參與上，皆已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可。

2019 年，令和元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於 10 月份推出紀念新天皇即位的特別展覽，主題為「正倉院的世界」。(圖 10) 官網上特別說明，此展雖以正倉院寶物為中心，但「聚焦於飛鳥、奈良時代國際色彩豐富的造形文化」。¹⁰⁷ 於德仁天皇即位禮期間，位於首都的博物館，在數量龐大的文物中，選擇了以正倉院寶物為展覽主題，可見日本人對此批寶物評價之高。¹⁰⁸ 而在展覽說明中，格外強調「國際色彩豐富」，更可見日本官方，面對全球化時代，積極地將自身保有的古代藏品，置入國際交流史視野的企圖。這樣的態度，實非二十一世紀的新發展，而可遠溯明治初期以來，古代珍藏漸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的脈絡。

106 相關例子可見：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 1880 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為中心的考察〉，頁 103-147，特別是頁 126-130。

107 「正倉院的世界」展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4 日，參觀人數達三十餘萬人。線上資訊見：東京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特別展「正倉院の世界—皇室がまもり伝えた美—」〉，《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https://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968 (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5 日)。

108 德仁天皇的「即位禮正殿儀式」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舉行，是一系列即位活動的中心儀式。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明治) 石田爲武，《英國ドクトルドレスセル同行報告書》，出版商資訊不詳，1877，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明治)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回奈良博覽會 B) 第一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一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 579。
- (明治)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回奈良博覽會 B) 第二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一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 580。
- (明治)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回奈良博覽會 B) 第六號，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覽會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一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頁 582。
- (明治) 〈奈良博覽會結社濫觴及沿革概略譜〉，原文抄錄於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 卷 4 號，2013 年 3 月，頁 76-77。
- (明治) 《東瀛珠光》全 6 輯，東京：審美書院，1908-1909。
- (明治) 《國華餘芳：正倉院御物》，東京：印刷局，1881。
- (明治) 〈諸縣報知〉，《郵便報知新聞》，明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75 年 5 月 28 日），轉引自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 卷 4 號，2013 年 3 月，頁 63。
- (明治) 〈藤田文庫 明治八年創立奈良博覽會〉，原文抄錄於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覽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 卷 4 號，2013 年 3 月，頁 100-101。
- Dresser, Christoph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 D’Avennes, Émile Prisse. *L’Art arabe d’après les monuments du Kaire*, Paris: A. Morel et C, Libraires-Éditeurs, 1869-1877.
- “The Nara Exhibition.” *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12, 1875. Accessed August 10, 2021. <https://play.google.com/books/reader?id=CmMvAQAAAMAJ&pg=GBS.PA508&hl=zh-TW&printsec=frontcover>.

近代論著

- 巫佩蓉，〈二十世紀初西洋眼光中的文人畫：費諾羅沙的理解與誤解〉，《藝術學研究》，10 期，2012 年 5 月，頁 87-132。

- 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 1880 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爲中心的考察〉，《新史學》，31 卷 1 期，2020 年 3 月，頁 103-147。
- 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藝術學研究》，27 期，2020 年 12 月，頁 1-42。
- 唐納德·基恩 (Donald Keene)，曾小楚、伍秋玉譯，《明治天皇：睦仁和他的時代 1852-1912》(*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新北：遠足文化，2019。
- 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 丸山宏，〈近代ツーリズムの黎明：「内地旅行」をめくって〉，收入吉田光邦編，《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変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 89-112。
- 丸山宏，〈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覧会〉，收入吉田光邦，《万国博覧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頁 221-248。
- 山上豊，〈正倉院御物と奈良博覧会——とくに明治 10 年代の動向を中心に〉，《歴史評論》，573 期，1993 年 1 月，頁 28-39。
- 山上豊，〈近代奈良の観光と奈良博覧大会—奈良県行政文書等を通して—〉，《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23 卷 4 號，2013 年 3 月，頁 55-101。
- 山田陽子，〈サウス・ケンジントン博物館と日本：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運んだ 1876 年の寄贈品選定基準について〉，收入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14-23。
- 木村法光，《日本の美術 294 正倉院の調度》，東京：至文堂，1990。
- 中川あや，〈正倉院北倉に納められた鏡〉，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頁 124-126。
- 中野政樹，《日本の美術 141 正倉院の金工》，東京：至文堂，1978。
- 内藤榮，〈正倉院宝物の成立——聖武天皇の宝物、薬物の献納と戒律〉，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頁 6-12。
- 田中陽子，《日本の美術 520 正倉院の舞楽装束》，東京：至文堂，2009。
- 田良島哲，〈大正期の正倉院拝観資格の拡大と帝室博物館総長森鷗外〉，《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666 號，2017 年 2 月，頁 29-46。
- 正倉院事物所編，《正倉院宝物》全 10 冊，東京：朝日新聞，1994-1997。
- 北廣麻貴，〈メディアの中の奈良博覧会：明治期の新聞記事からの考察〉，《ディア学：文化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30 期，2015 年，頁 1-16。
- 西川明彦，《日本の美術 486 正倉院宝物の裝飾技法》，東京：至文堂，2006。
- 西川明彦，《日本の美術 523 正倉院の武器・武具・馬具》，東京：至文堂，2009。

- 西山厚，〈正倉院宝物とその公開〉，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4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2，頁 6-12。
- 米田雄介，《正倉院宝物の歴史と保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 成瀬正和，《日本の美術 522 正倉院の宝飾鏡》，東京：至文堂，2009。
- 尾形充彦，〈正倉院の染織文様の世界性〉，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4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2，頁 116-119。
- 阿部弘，《日本の美術 117 正倉院の楽器》，東京：至文堂，1976。
- 佐藤秀彦，〈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来日と英国の寄贈品〉，《郡山市立美術館研究紀要》，2 號，2001 年，頁 11-51。
- 佐藤秀彦，〈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の宝物調査〉，收入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6-13。
- 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松本包夫，《日本の美術 102 正倉院の染織》，東京：至文堂，1974。
- 松本包夫，《日本の美術 293 正倉院の錦》，東京：至文堂，1990。
- 和田軍一，《正倉院夜話：宝物は語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67。
- 岡田讓，《日本の美術 149 正倉院の漆器》，東京：至文堂，1978。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58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6。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2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0。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4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2。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5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3。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6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4。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
-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2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20。
-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覧会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一十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
-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
-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
- 松島順正，《日本の美術 105 正倉院の書跡》，東京：至文堂，1975。
- 法隆寺編，《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仏教文化》，奈良：法隆寺，1989。

- 東野治之、〈正倉院宝物の明治整理——正倉院御物整理掛の活動を中心に〉、收入大阪大學文學部日本史研究室編、《古代中世の社会と国家》、大阪：清文堂、1998、頁221-242。
- 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
- 後藤四郎、《日本の美術 140 正倉院の歴史》、東京：至文堂、1978。
- 高木昭作、末木文美士、《日本文化研究：神仏習合と神国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5。
-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東京：校倉書房、1997。
- 高橋亮一、〈正倉院の近代—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保存政策とその過程—〉、《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40 輯、2015 年 3 月、頁 93-119。
- 高橋隆博、〈「奈良博覧会」について——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の動向と関連して〉、《月刊文化財》、217 期、1981 年 10 月、頁 37-45。
- 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覧会」陳列目録について〉上、《史泉》、56 期、1981 年 11 月、頁 76-118。
- 高橋隆博、〈明治八・九年の「奈良博覧会」陳列目録について〉下、《史泉》、57 期、1982 年 12 月、頁 47-82。
- 高橋隆博、〈明治初期の文化財保護と正倉院〉、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正倉院宝物に学ぶ 3》、京都：思文閣、2019、頁 119-137。
- 飯田剛彦、《日本の美術 521 正倉院の地図》、東京：至文堂、2009。
- 飯田剛彦、〈正倉院の歴史〉、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頁 9-17。
- 飯田剛彦、〈東大寺献物帳と法隆寺献物帳〉、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頁 46-47。
- 鈴木廣之、〈明治期の正倉院——宝物の調査、展示、評價〉、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正倉院宝物に学ぶ 2》、京都：思文閣、2012、頁 3-19。
- 楠家重敏、《ジャパノロジーことはじめ：日本アジア協会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17。
- 蜷川式胤著、米崎清実編、《奈良の筋道》、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5。
- 関秀夫、《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2005。
- 関根眞隆、《日本の美術 193 正倉院の木工芸》、東京：至文堂、1982。
- 関根眞隆、〈正倉院遺宝伝來の記〉、收入関根眞隆、《新編名宝日本の美術 第 5 卷 正倉院》、東京：小學館、1990、頁 102-137。

関根眞隆，〈正倉院の記〉，收入関根眞隆，《新編名宝日本の美術 第5卷 正倉院》，東京：小學館，1990，頁61-67。

関根眞隆，《新編名宝日本の美術 第5卷 正倉院》，東京：小學館，1990。

関根眞隆，〈正倉院宝物の製作地の問題〉，收入関根眞隆，《正倉院への道：天平美術への招待》，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193-220。

藤岡了一，《日本の美術 128 正倉院の陶器》，東京：至文堂，1977。

瀧悌三，《日本近代美術事件史》，大阪：東方出版，1993。

Halén, Widar. *Christopher Dresser: A Pioneer of Modern Design*.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90.

Hardacre, Helen. *Shintō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Kornicki, Peter Francis. "Display and Changing Values: Early Meiji Exhibitions and Their Precursors." *Monumenta Nipponica* 49:2 (1994): 167-196.

網路資料

奈良國立博物館，〈第73回正倉院展〉，《奈良国立博物館官網》，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special/202110_shosoin/，檢索日期：2022年1月24日。

奈良縣立圖書館，〈圖書展示「正倉院展と奈良博覽會～正倉院宝物公開の歴史～」平成30年11月1日（木）～29日（木）〉展示パネル一覽（PDF），《奈良県立図書館情報館》<https://www.library.pref.nara.jp/sites/default/files/narahaku2018.pdf>，檢索日期：2021年6月30日。

奈良縣立圖書館まほろばライブラリー檢索，〈奈良博覽會物品目錄〉，《奈良県立図書館情報館》<https://meta01.library.pref.nara.jp/opac/repository/repo/153598/#?c=0&m=0&s=0&cv=0&r=0&xywh=1931%2C-996%2C7664%2C6704>，檢索日期：2022年7月27日。

東京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特別展「正倉院の世界—皇室がまもり伝えた美—」〉，《東京国立博物館官網》https://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968，檢索日期：2021年7月5日。

e國寶，〈壬申檢査關係資料〉，《e国宝》https://emuseum.nich.go.jp/detail?langId=ja&webView=&content_base_id=100815&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img_id=null&page_id=null，檢索日期：2021年8月23日。

圖版出處

- 圖 1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一號，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藏。圖版取自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まほろばライブラリー検索 <https://meta01.library.pref.nara.jp/opac/repository/repo/153598/#?c=0&m=0&s=0&cv=0&r=0&xywh=-552%2C-475%2C11036%2C7964>，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 圖 2 《鳥毛帖成文書屏風》，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5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3：展件 5，頁 20-21。
- 圖 3 〈会場第三区大仏殿内正倉院宝庫御物陳列目録〉第六號，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藏。圖版取自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まほろばライブラリー検索 <https://meta01.library.pref.nara.jp/opac/repository/repo/153598/#?c=0&m=0&s=0&cv=0&r=0&xywh=-552%2C-475%2C11036%2C7964>，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 圖 4-1 《膺蜜》（蜜蠟），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頁 26-27。
- 圖 4-2 《膺蜜》（蜜蠟），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9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7，頁 26-27。
- 圖 5 〈玻璃水瓶簡圖〉（Rough Sketch of a Glass Ewer）（卓瑟插圖 29）。圖版取自 Dresser, Christoph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100.
- 圖 6 1882 年，〈奈良的古老木造建物〉（The old Wooden Building in Nara）（卓瑟插圖 30）。圖版取自 Dresser, Christoph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102.
- 圖 7 《白琉璃瓶》，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66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4：展件 56，頁 114-115。
- 圖 8 《紫地狩獵文錦》，正倉院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正倉院の世界》，東京：讀賣新聞社，2019：展件 112，頁 226。
- 圖 9-1 《金銀花盤》，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展件 29，頁 90-92。
- 圖 9-2 《金銀花盤》，正倉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第 71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9：展件 29，頁 90-92。
- 圖 10 2019 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の世界特展」。圖版取自 1089 ブログ（東京國立博物館部落格）<https://www.tnm.jp/modules/rblog/index.php/1/2019/10/18/%E5%BE%A1%E5%8D%B3%E4%BD%8D%E8%A8%98%E5%BF%B5%E7%89%B9%E5%88%A5%E5%B1%95%E3%80%8C%E6%AD%A3%E5%80%89%E9%99%A2%E3%81%AE%E4%B8%96%E7%95%8C%E3%83%BC%E7%9A%87%E5%AE%A4%E3%81%8C%E3%81%BE%E3%82%82%E3%82%8A%E4%BC%9D%E3%81%88%E3%81%9F%E7%BE%8E%E3%83%BC%E3%80%8D/>，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

The Shōsōin Exhibitions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nd Related Reports by Westerners: An Early Example of Modern Viewers Transforming Ancient Treasured Possessions into Cultural Relics*

Wu, Pei-jung**

Abstract

The Shōsōin Treasury, located within the Tōdaiji temple, and its collection, are not only cherished by Japanese, but also appreciated by other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ost valuable point is that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he Shōsōin items trace back to the eighth century, and their styles demonstr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West Asia and East Asia. However, when did the Shōsōin Treasury become known to foreigners? What was the situation when the treasures were first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nd, how did foreign visitors write about th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The first is to discuss the exhibitions held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where the Shōsōin items were shown. The second is about a report related to the first Nara exhibition from *The Japan Weekly Mail* in 1875. The third is about the writing by an English designer,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who saw the treasury and its collection in 1877.

It was not until the 1890s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e the Shōsōin items. However, in spite of academic research not taking place in the 1870s, the treasures had already attracted visitors with their diversity. These reports in English showed that the viewers we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various styles of the treasures reflecting multiple cultures. They were considered as evidence of the interchange among various areas in Asia. The “Nara Treasury”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given that it was reported as early as the 1870s, while other distinct discoveries, such as the famous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show that ancient cultural interchange was not well known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Shōsōin, Nara Exhibition, inter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apan Weekly Mail*, Christopher Dresser

* Received: 23 August 2021; Accepted: 29 June 2022.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會場第三區大佛殿內正倉院寶庫御物陳列目錄第一號

第壹號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 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p>牙尺一 牙尺二 牙尺三</p>

(Note: The above table is a simplifi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id-like content in the image, which contains detailed descriptions and measurements of various objects.)

圖 1 會場第三區大佛殿內正倉院寶庫御物陳列目錄第一號 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藏



圖2 鳥毛帖成文書屏風 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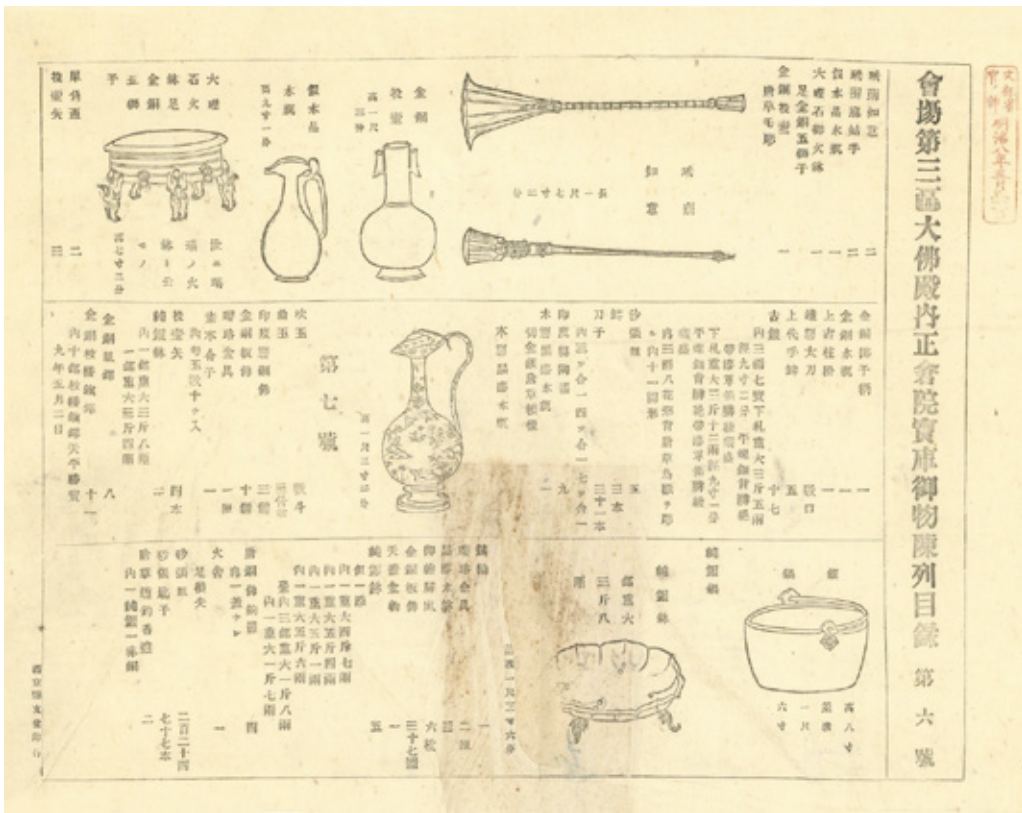


圖 3 會場第三區大佛殿內正倉院寶庫御物陳列目錄第六號 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藏



圖 4-1 腦蜜（蜜蠟） 正倉院藏



圖 4-2 腦蜜（蜜蠟） 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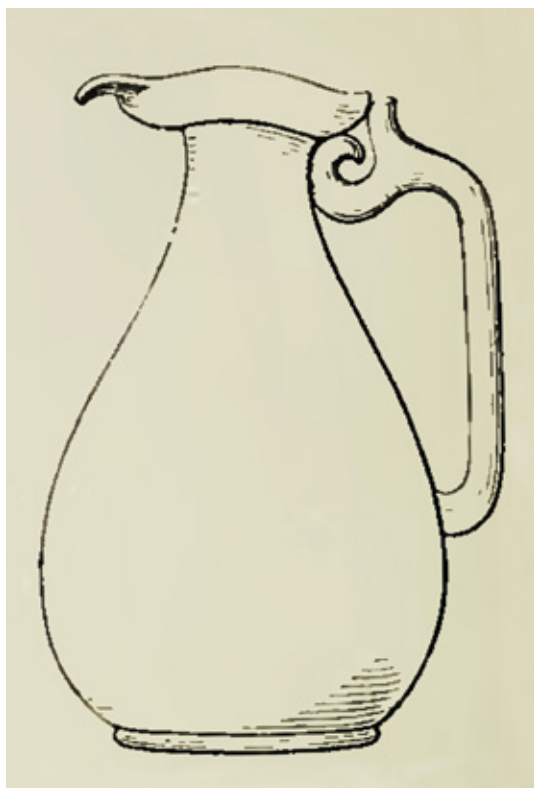


圖 5 玻璃水瓶簡圖 Rough Sketch of a Glass Ewer (卓瑟插圖 29)



圖 7 白琉璃瓶 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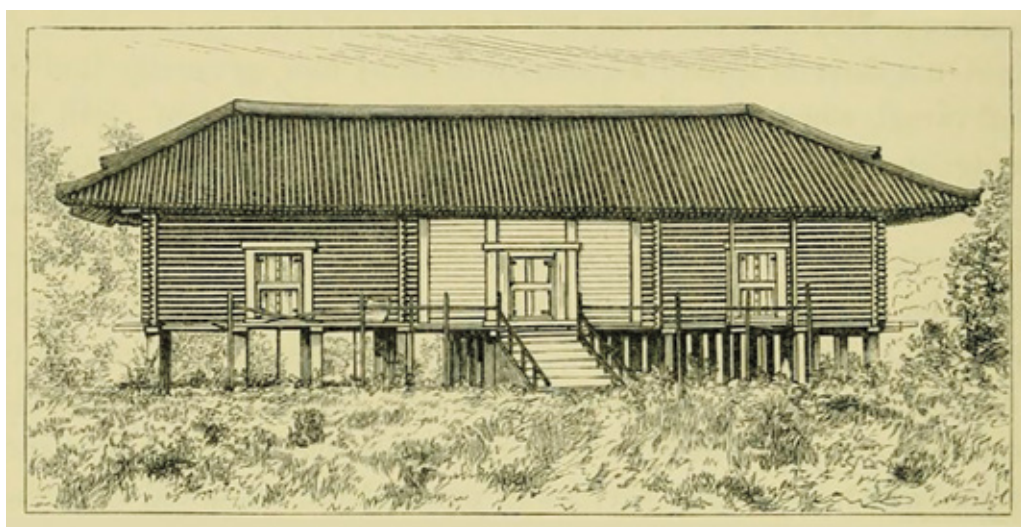


圖 6 奈良的古老木造建物 The old Wooden Building in Nara (卓瑟插圖 30)



圖 8 紫地狩獵文錦 正倉院藏



圖 9-1 金銀花盤 正倉院藏



圖 10 2019 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特展」



圖 9-2 金銀花盤 正倉院藏